

姚雪芬 铿锵铁片韵味长

■ 记者 田莹

在天津曲艺百年谱系中,铁片大鼓以婉转诙谐、酸而不媚的独特韵味自成一脉,被观众亲切地称为“醋熘大鼓”。这一无谱无本、全凭口传心授的曲种,是典型“靠人保活”的传统艺术,而从艺六十六载的姚雪芬,正是这门艺术的守护者。

姚雪芬 11 岁入行,16 岁灌制第一张唱片;她亲历了曲艺的黄金时代,也直面过曲艺市场步入低谷;她在音配像中重读师父的艺术精髓,也在生活采风中滋养了唱腔韵味。她的人生没有跌宕起伏的传奇,却以纯粹的坚守,把铁片大鼓唱进了岁月,刻入了年轮。走近姚雪芬,便是走近了一段活态传承的曲艺史,走近了一位老艺术家干净、坦荡、赤诚的内心世界。

王佩臣的入室弟子 津门曲荟技惊四座

1960 年 7 月,11 岁的姚雪芬被选入天津市曲艺团少年训练队。她扎着两条麻花辫,个子矮矮的,还不知道曲艺是什么,更不知道铁片大鼓为何物,只知道自己喜欢唱歌,来这学习,将来就能站上舞台。

经过半年时间的试训,合格的学员留团正式学艺。老师把几个小演员叫到一起分曲种,挨个儿测验:会唱京韵大鼓吗?唱两句。会唱梅花大鼓吗?唱两句。当问到乐亭大鼓时,姚雪芬摇了摇头。

老师口中的乐亭大鼓,就是铁片大鼓,以演唱时敲击铁片(实为铜片)而得名。20 世纪 20 年代初,女艺人王佩臣与弦师卢成科合作,对唱腔进行加工、规范,形成了独特的风格。20 世纪 50 年代改称乐亭大鼓,80 年代又恢复了铁片大鼓原名。

姚雪芬回忆:“曲艺团的老师觉得我的嗓音条件适合唱铁片大鼓。当时王佩臣老师已经退休了,平时不在团里,我先是跟着她的弦师谢瑞东老师学了一段《姜太公卖面》,然后才正式到王老师家,登门拜师。”

至今她还记得第一次见到王佩臣老师时的情景。“我懵懵懂懂地跟在桑红林、王慧芝二位老师身后进门,见到了鼎鼎大名的王佩臣老师。唱完《姜太公卖面》,我站在那儿,大气儿不敢喘,等着王老师的点评。王老师表情特别平静,既没说好,也没说不好,只说了句‘先回团吧’。”

姚雪芬有点儿失望,以为王老师不喜欢自己的表演。可让她没想到的是,当天下午就收到了通知:从明天开始,每天上午到王老师家上课。

王佩臣教学特别严肃,上课时基本不笑。姚雪芬从心里怕老师,但怕归怕,学归学。铁片大鼓没有曲谱,也没有讲义,全靠老师唱一句,她学一句,吐字、行腔、板眼、身段,分毫不能差。姚雪芬年纪小,嗓子嫩,老师就把调门压在适合她的位置,一句一句带着她走。那时她不懂,很多年后自己当了老师,才明白这有多不容易——年近 60 岁的艺术家,跟一个 12 岁的小孩同调门唱,那是老师在将就她,在护着她的嗓子。

讲述

河北区文化馆里的国潮音乐人

把民族音乐推向时尚前沿

讲述 桑田 采写 张洁

从社区广场唱到央视春晚,从评剧、中阮到电子乐,河北区文化馆干部、新潮乐队“乐兽森林”主理人桑田用他独有的“混搭”方式,唱出了自己的音乐人生。他说:“好音乐不是关在屋里写出来的,是在一次次演出、一阵阵掌声中生长出来的。”

生在评剧团 爱上摇滚乐

我出生在一个戏曲之家:妈妈是评剧演员,在剧团唱主角;爸爸是乐师,弹得一手好琵琶。妈妈怀我六个月时还在台上唱戏。他们每年要演百余场,最省事的办法就是把我带在身边。所以从记事起,我便跟着他们坐上大篷车,在天津周边的乡镇辗转颠簸。

那时剧团的演出条件,搁现在想都不敢想。一辆大卡车装着拆散的木板,到地方后临时拼出一个舞台。我爸爸和团里的男同事一起,往地里钉棚子,撑幕布,架灯光。这些活儿又危险又累,可大伙儿一块出力流汗,干完了锣鼓一响,开戏,看见台下乡亲们坐得满满当当,多累都忘了。我爸妈那一代人,身上有种特别

姚雪芬是那种要强的孩子,她怕老师,更怕自己唱不好。团里没有硬性要求练早功,她给自己定规矩,天蒙蒙亮,星星月亮都还没退,她就起来了,去宿舍附近河边吊嗓子。冬天冷风刮着脸,夏天蚊虫围着转,她从没间断过:“我自小干什么都认真,吃饭认真,练功认真,能出成绩就是因为这认真劲儿。”

一年多以后,王佩臣生病住院。姚雪芬每天上午去医院,一边照顾老师,一边在病床前学唱。下午回到团里,找个没人的地方,一遍一遍地练。她学会了十段活——六段传统的,四段现代的。《姜太公卖面》《玉堂春》《良心》……这些唱段,一字一句都刻进了她心里。

1964 年,王佩臣病故,15 岁的姚雪芬成了这门艺术最年轻的传人。团里安排琴师马涤尘带姚雪芬,教她新段子,帮她设计唱腔。《一张车票》《义勇理发员》《半夜喂猪》等现代题材作品,都是这段时间学的。

姚雪芬自己也琢磨:这个字师父会怎么发音?这段词该如何行腔?这个气口换在哪里最舒服?她练出了一个特殊的本事:不管哪个派别,什么唱腔,听几遍就能唱得像模像样。她说:“我想,不能只精专一派,别的也得懂。万一哪天观众点别的,我不能说不会。要在台上站得住,就得自己有点东西。”

凭着扎实的功底与日渐成熟的舞台风范,姚雪芬在青年演员中脱颖而出。1965 年,她灌制了唱片《越南南方一少年》,“那年我刚刚 16 岁,能取得这个成绩,并不是我的艺术水平有多高,主要还是要感谢领导的认可和观众的厚爱。”

20 世纪 80 年代,“津门曲荟”恢复举办,姚雪芬的演唱技惊四座,被誉为“小王佩臣”。她继承了师父的“醋熘”神韵,又额外多出了几分端庄清正的底色。“唱腔可以酸,人不能酸。酸是铁片大鼓的魂,但必须立在正道上,才对得起这门艺术。”这是她给自己定的规矩。有听众形容:“听姚雪芬唱铁片大鼓,就像吃了一口地道的醋熘白菜,酸得爽口、醇而不烈,过瘾却不倒牙。”

深入基层体验生活 为老艺术家音配像

姚雪芬学铁片大鼓继承了传统,也创作和表演了大量新编作品,写新时代的人,唱生活里的真事,讲普通人的故事。要把不同身份、不同性格的人物唱活,光靠唱腔远远不够,必须扎进生活里,去看、去听、去感受。她从不把“体验生活”挂在嘴边,从不觉得这是值得夸耀的事,而当年那些深入生活的往事,却深深刻在她的记忆里。

为了唱好歌颂海上船工的《冰河结缆》,姚雪芬跟团里的同事一起到大沽口体验生活,乘渔船出海。船驶入渤海湾,风浪袭来,船身就像一片树叶似的摇来晃去。同行的马涤尘和曲艺团团长王济皋得厉害,一人把住一边船舷,面色发灰、呕吐不止。姚雪芬把自己带的咸菜、山楂分给两位老师,帮他们缓解晕船症状,也记着船工教的法子,用手搂着桅杆,眼睛往前看,一口水都不敢喝。这段经历,她后来常常当成趣事讲,没有诉苦的意思,只觉得是一段难忘的插曲。这些海面上的颠簸、冷风中的颤抖,让她心里有了画面,唱到劳动者的坚韧时,不用刻意表演,劲儿自然就到了。

可贵的东西,吃苦耐劳,骨子里透着乐观,再糟心的事到他们那儿都不算什么,也让我觉得,只要爸妈在,天塌下来也不怕。我印象最深的是冬天唱戏,露天的场子,西北风刮得幕布哗哗作响,灯光架子东倒西歪,可演员照唱,观众照看。最怕的是下雨,雨点子一落,大伙儿就得赶紧拿油毡布把音响盖上,浇坏了麻烦就大了。剧团的库房是我的游乐场,刀枪棍棒、锣鼓镲片,陪伴我度过了整个童年,我也跟着爸爸学会了弹琵琶、弹中阮,吹笛子,吹箫。而真正对音乐产生不一样的感觉,是在我十岁那年,一部美国电影里的摇滚乐,像一道闪电击中了我,浑身起鸡皮疙瘩。我疯狂地迷上吉他,没日没夜地练琴,手指头磨出了厚厚的茧子。爸妈不太想让我走这条路,他们是苦过来的,觉得干这行养不了家,想让我好好念书。但我放不下。有一回妈妈催我写作业,我说肚子疼去趟卫生间,抱着琴躲进去,一坐就是一个多小时。他们见我这么执着,也就不再阻拦我了。

大学时,我学的是作曲专业,但一门心思往北京跑,想当歌手、当明星。最幸运的是认识了常石磊老师,他把我介绍给他的制作人。当时老师们正在为林忆莲等歌手制作专辑,我在那儿当助理,学到了很多。不巧的是,我爸爸病倒了,需要人照顾,我义无反顾回了天津。我毕业时,赶上河北区文化馆招聘,爸爸建议我报考。虽然考试、入职都很顺利,但那时我的心还没有安定下来,满脑子想的还是外面的世界,不愿意被一个单位拴住。后来发生了一些事,才让我渐渐爱上了这个职业,找到了存在的意义。



桑田

桑田说,“乐兽森林”这个名字,是取自“乐兽”和“森林”,寓意着音乐的多样性和生命力。他们希望用音乐的力量,去唤醒人们内心深处的热情,去创造属于这个时代的声音。

桑田说,“乐兽森林”这个名字,是取自“乐兽”和“森林”,寓意着音乐的多样性和生命力。他们希望用音乐的力量,去唤醒人们内心深处的热情,去创造属于这个时代的声音。

扎根群众文化 建国潮乐队

“群众文化”这个词,我从小听我妈说过,可从没想过自己会做这件事,因为我总觉得音乐就该市场化,出专辑、开演唱会、上综艺节目,那才叫搞音乐。来到文化馆之后,我接触到截然不同的概念:演出场不是体育馆、剧场,而是社区广场、河边公园、村里的戏台;观众不是买票进场的年轻人,而是推着婴儿车的阿姨、拎着马扎的大爷、放学路过的小学生。说实话,一开始我觉得落差很大,

她也下过部队、走过乡间。《风雨行》里“山清水秀百鸟鸣”的开阔意境,农村大嫂携儿带女回娘家的温馨画面,都来自她见过的山川、遇到过的人。她说:“心里有景,观众才能看见;脚下有生活,唱腔才不空。”

20 世纪 80 年代,相声火爆,鼓曲走向边缘地带。台下观众越来越少,姚雪芬也动过改行的念头,甚至和苏文茂老师开玩笑说,想拜入他门下,改行说相声。可一想起师父在病床上还坚持一字一腔地教自己唱大鼓,想起团里领导、老师们的培养,想起史文秀和桑红林两位老艺术家都曾告诉她,“别看你师父不苟言笑,但对你真是寄予厚望”,她就怎么也割舍不了这门艺术。

当时也是传统曲艺抢救恢复的关键期,姚雪芬决心找回师父那失传的唱腔。旧资料不容易查,即便查到,也很难复原。就在这时,曲艺团编剧组的蔡源利送来一盒王佩臣《刘伶醉酒》的录音磁带。姚雪芬如获至宝:“那是师父原汁原味的唱腔,是快要失传的声音!”她日夜听、反复学,还把磁带拿出来和同行交换、分享。后来很多演员学的《刘伶醉酒》版本,正是从姚雪芬这儿传出去的。

1985 年,天津市率先启动京剧音配像试录,目的是为抢救和保护传统艺术、留住老艺术家的经典剧目与珍贵录音。京剧音配像试点成功后,这一抢救工程扩展到传统戏曲、北方鼓曲等领域,尽可能地保护濒临失传的老腔老调。

为王佩臣音配像的任务,落到姚雪芬的肩上。她感到荣幸,更深知这个担子极重。她说:“拿到师父的录音后,我白天黑夜地听。没有曲谱,没有文字稿,我就先凭耳朵听、心里记。对我来说,这不是简单地为声音配像,而是第二次跟着师父学艺;不光要在唱腔上找到感觉,鼓板、节奏、气口和乐队的默契程度也要达到最高标准。这段经历,让我真正触碰到了师父铁片大鼓艺术的精髓。”

最终的成片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放映,台下坐满了曲艺界的领导、名家。背景传来王佩臣的原声,画面中的姚雪芬身着老师最爱的深色旗袍,脑后挽着矮髻,手里的鸳鸯板和鼓槌子跟录音中的节奏配合得天衣无缝,真可谓形神兼备、气韵十足。

放映结束,全场掌声雷动。姚雪芬和马增慧老师一起坐在会场角落,马增慧兴奋地想拉她站起来,还高声喊道:“姚雪芬在这儿呢!”但姚雪芬特别害羞,就只是拘谨地坐在那儿,直到掌声落下。看片会结束后,张君秋先生走到她跟前,握住她的手勉励说:“雪芬呐,有演出就去唱,多上舞台,让更多人听到铁片大鼓。”这份认可,她一直默默记在心里。

抵抗病魔难舍鼓曲 教徒授课分文不收

通过音配像,王佩臣的艺术风采生动地呈现在大众面前,也让姚雪芬真正接过了师父的衣钵,担起铁片大鼓传承的担子。可就在此时,她的身体亮起红灯——她一向要强,却架不住常年劳累,肝脏出了问题,病痛缠身,不得已 48 岁就办理病退,离开了舞台。

2011 年 4 月,伴随她多年的肝囊肿持续恶化,仅靠抽腹水已无法缓解腹胀和疼痛,姚雪芬接受

可奇怪的是,我的状态来得特别快。可能是因为我小时候跟着爸妈演出的记忆太牢固了吧,那些露天的场子、围坐的乡亲,演完了还舍不得走的观众,和我现在的工作场景简直如出一辙。

文化馆的同事都是多面手,作曲、演唱、演奏、调音、跳舞各司其职。我刚来时,单位里有一个五十多人的大型民族乐队,其中不少人是歌舞剧院的退休乐手;还有一个十几人的小型民族乐队。记得我们去莫斯科演出,我尝试着把现代音乐的编曲和民乐结合起来,排练了意大利小提琴名曲《查尔达什舞曲》、阿根廷作曲家皮亚佐拉的《自由探戈》等曲目。现在回过头看,那些尝试就是在为国潮音乐打基础。

我常把作曲比作炒菜。文化馆的工作就像守着一个大灶台,食材特别丰富,评剧、民乐、电子乐、摇滚,什么都有,只要炖的时间够久,用料放得对,它一定会好吃。老百姓的口味就是标准,大家爱听热闹的,咱们就不能弄得太冷清。

2022 年,我和几个朋友组建了国潮乐队“乐兽森林”,“乐”是音乐,“兽”代表原始的生命力,合在一起,就是想让民族音乐回到它最鲜活的样子。这几年总有人问我:你做的音乐到底是民乐还是摇滚?我说:甭管算什么,好听就行!

小时候我总觉得吉他比琵琶带劲,外国人的布鲁斯比咱们的戏曲、民乐更过瘾。可后来听得多了,见得多了,才慢慢体会到中国音乐和西方音乐压根儿是两个路数,西方讲究和声,中国讲究韵味,各有各的好。举个最典型的例子:琵琶和阮都是那种颗粒感十足的声音,就是“点睛”用的,硬拿它去弹西方音乐的和弦,怎



姚雪芬

1949 年出生,天津市曲艺团铁片大鼓演员。铁片大鼓表演艺术家王佩臣的弟子。代表作品有《姜太公卖面》《玉堂春》《良心》《风雨行》等。

了手术治疗。术后不到一个月,还在卧床休养时,一份沉甸甸的通知送到她手中,让她到天津市第三工人文化宫领取“铁片大鼓非遗传承人”证书。虽然大病初愈,行动不便,但姚雪芬还是亲自去领回了证书。手捧证书的那一刻,她的心里又酸又热,知道这份荣誉不仅是光环,更是重担。

姚雪芬心里最清楚铁片大鼓这门艺术的处境。那时候,中国北方曲艺学校并没有专门教授铁片大鼓的班级,即便少数学生学会了这门艺术,毕业后也无用武之地。她悉心培养过一名学生,小姑娘天分好,肯用功,毕业后被北京曲艺团录取。可是收入太少,连房子都租不起,更别提养活自己了,她坚持不下去,改行做了房地产销售。提起这件事,姚雪芬难免惋惜,可并没有埋怨学生,“人要吃饭,要活命,换谁都得这么选。只是看着唱这曲种的人一天比一天少,我心疼啊。”

只要还有人肯学,她就倾尽全力地教,她说:“谁想跟我学,只管来,我分文不取、倾囊相授!师父当年怎么教我的,我就怎么教学生,绝不藏私。”有人劝她:“不收费不合规矩,您没事,可会不会得罪别人呢?”她只淡淡地回了一句:“我跟老老师学的时候,她就没有收我一分钱。”

老一辈艺术家教徒,讲究口传心授,师父唱一句,徒弟学一句,很少讲理论。到了姚雪芬这儿,她把那些只可意会的东西,一点点归纳成了门道儿,哪个字该放在什么位置,气息怎么控制,不同曲种的发声方法怎么借鉴,她都掰开揉碎了讲给学生听,绝不藏着掖着。学生也觉得,跟姚老师学东西很轻松,领悟得快。

2026 年,姚雪芬从艺整整六十六年。当年那个站在师父王佩臣面前、拘谨得不敢抬眼看人的小姑娘,如今已是铁片大鼓艺术最坚实的守护者。她还有一个最大的心愿:“铁片大鼓到了‘靠人保活’的关口,我甘当人梯,别人踩着我的肩膀往上走,我也绝不拦着。只希望我们一起努力,把铁片大鼓这门艺术传承下去。”

用音乐表达 内心的想法

2019 年,妈妈过生日,我琢磨着送她一件特别的礼物——给她写首歌。我从小就听评剧《刘巧儿》,妈妈在团里演了一辈子巧儿,家里至今保存着她抱着幼年的我唱“巧儿我采桑叶来养蚕”的视频。我以巧儿的唱腔为基础,写了流行歌曲《巧儿》。里面有一句词:“落满红红到小巷。”我想,巷子口、胡同边,这些不起眼的地方,一样可以开出美丽的花。这也正是巧儿这个人物的基调,家里给她定了娃娃亲,她不愿意,非要嫁给自己喜欢的人,追求自己的幸福。我爸妈那一辈戏曲人也是一样,剧团那么难,那么辛苦,但他们因为热爱,哪儿都没去,就守着那个小小的舞台。妈妈听完这首歌,特别高兴,但也叹了口气说:“你们这代人啊,连天津话都说不利索了,等到你们的下一代,知道评剧的怕是更少了。”当时我就觉得,不能这么放弃,哪怕我写的歌只有一小段评剧的影子,只要多一个人听到,它就没有断。

我又写了《三碗不过冈》。这首歌的旋律是为中阮写的,讲武松的故事,其实是在写我和爸爸。爸爸为这个家操劳了一辈子,被生活磨得没了棱角,他总想告诉我:哪条路能走,哪条路走不得,劝我别去招惹山上的老虎。可我

对话姚雪芬 以传统为根 培育新枝叶

记者:您用铁片大鼓的唱腔唱过流行歌曲《燃烧我的卡路里》,您怎么看这种传统与流行的结合?

姚雪芬:当时是电台节目邀请,主持人提议我尝试一下。我一开始不会歌词,对方告诉我之后,我完全按照铁片大鼓的板眼、唱腔来唱,没有随意改动,更没有丢掉曲种本身的韵味。我就是想做一次尝试,让年轻人知道,铁片大鼓不是陈旧老套的艺术,它也能贴近生活、贴近时代。我一向不保守,传统艺术不能关起门来孤芳自赏,得让年轻人听得进去、愿意喜欢,传承才有希望。那次演出效果很好,不少年轻听众反馈说,原来铁片大鼓这么有味道。我觉得这就足够了。创新的核心不是颠覆传统,而是以传统为根,长出新的枝叶。

记者:听说您特别喜欢看体育比赛?

姚雪芬:我最爱看乒乓球和台球。乒乓球讲究稳、准、巧,节奏清晰、章法分明,心态要稳、基本功要硬,这和我们唱戏曲的道理一样,台上的每一分精彩,都是台下长年累月苦练出来的。台球看起来安静平和,实则考验定力、判断力与精准度,必须沉得住气、稳得住心神,才能把握好每一次出杆的角度与力度。我看比赛不只看热闹,更佩服运动员的专注、严谨与坚持。无论曲艺还是体育,想要做到极致,都必须静下心来,扎扎实实地下功夫。

记者:您觉得铁片大鼓现在遇到的最大困难是什么?

姚雪芬:最核心的困境就是人断档、无依托、少关注。铁片大鼓没有完整的曲谱,全靠人传、人保活,一旦没有人学、没有人唱,曲目立刻就会失传。王佩臣老师年轻时靠铁片大鼓名噪一时,能够挣大钱。而现在年轻人很难依靠这门艺术安身立命,好苗子留不住,稳不下。另外,它属于小众曲种,社会关注度不高,登台表演的机会少,慢慢就被边缘化了。

记者:对喜欢鼓曲艺术的年轻人您有什么建议?

姚雪芬:我有四句话送给他们:先学做人,再学唱戏;苦练基本功,守住正宗味;沉下心来不浮躁,扎下根不放弃;爱它才能为它负责。学艺先学德,人品端正,艺术才能走得正、行得远。铁片大鼓的板眼、吐字、韵味、分寸都是硬功夫,不能偷懒,不能糊弄。一定要守住正宗流派特色,不能乱改、不能低俗化,不能为了流量丢掉老祖宗的东西。不要学两段就骄傲自满,艺无止境,只要你们真心热爱、肯下苦功,我随时都在,我所有的段子、所有的技艺窍门,全都会倾囊相授,一分钱不收。我就盼着,你们能把这门艺术传下去。

(图片由姚雪芬提供)

觉得,如果连上山的胆量都没有,一辈子也活不出什么名堂。这首歌就是跟父辈对话,你有你的经验,我也有我的勇气,谁也说服不了谁,谁也无法不开谁。

这些年我去过不少地方采风。去湘西,在苗寨遇到一位卖板栗的婆婆,我问她会唱苗歌吗?旁人告诉我,她年轻时是寨子里唱得最好的。我们就那么站着,我拿中阮,她一边炒栗子一边唱,即兴合作。她的声音特别真,特别亮,没有半点技巧,却一下子触动了我。后来,我把那次经历写进歌里,每多一人聆听,它就多了一分生机。

创作《开山》时,我想先把那些条条框框拆了再说。《秋夕》,是有一年中秋回不了家写的,《春游》,是在北辰郊野公园野餐时冒出来的灵感。有几百首歌我写了好多年,一直没完成,后来自己编曲、自己录音、自己混音,在工作室一点点打磨,才逐渐成熟。做歌有成本,预算不多就慢慢来,一首一首地试。

2026 年,我有幸参加了央视春晚歌曲《恭喜恭喜》的演唱。那是一个群体表演节目,对我来说只有短短的一瞬间,可走到这一步用了多久,只有我自己心里最清楚。我参加过《中国唱将》《开门大吉》《开门迎春晚》,跑过不少音乐节,但对我来说,“群众文化”是我的根,扎根社区,深入生活,才能创作出成熟的作品。

创作国潮音乐,我有一个小小的领悟——用好方言。方言是底色,没了底色,怎么唱都不对。拿我自己来说,小时候我对天津话和评剧都不以为意,长大后才渐渐明白,是当年自己不解其中味。所以我写旋律时,会本能地让它跟着天津话的声调走。天津的风土人情,刘巧儿的故事,都是我的来处,走出去再回来,才知道自己是谁。我最大的心愿,是把中国民乐带到世界舞台上。民族的就是世界的,这句话不能光说,得去做。